

帝国的兴衰

CCTV
大型历史纪录片

历时六年，首次以经济学视角，
破解秦汉帝国命运之谜。

段鸣镛◎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帝国的兴衰

CCTV
大型历史纪录片

段鸣滴◎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帝国的兴衰 / 段鸣镝著.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7-201-07327-9

I. ①帝… II. ①段…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秦汉时代 IV. ①K23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53088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 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北京分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700×1000毫米 16开本 14印张

字数：100千字

定价：39.80元

目 录

前言:新朝的悲歌 1

第一章 韩信封王:帝国的创始 15

第二章 众建诸侯:帝国的集权 45

第三章 分地运动:帝国的崛起 83

第四章 国进民退:帝国的衰败 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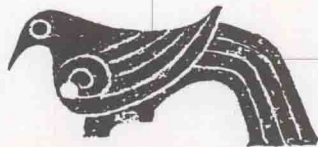
第五章 民有七亡:帝国的宿命 139

后记:儒、道、法:何以治国? 173

附录:一 秦、西汉、新朝大事年表 198

二 拍摄现场 202

三 场景图 206



前言：新朝的悲歌

公元第九年的1月10日，位居汉帝国摄政王的王莽宣布汉朝已亡，在群臣的拥护下登上皇位，改称新朝。我们之所以将王莽的登基称为“群臣的拥护”，是因为班固所著的《汉书》中并没有记载汉帝国出现反对王莽改朝换代的武力暴动事件。于是，史学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不流血的政变，王莽的登基得到了全体汉朝官员的支持。

我们今天所能掌握的有关王莽生平的资料，主要来自东汉班固所著的《汉书》。但是，班固是



● 意大利历史学家B·克罗齐

以汉家正统史学家的身份来编写历史的。根据意大利历史学家Benedetto Croce (B·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历史的编著都是为同时期的统治阶层服务的。为了给东汉刘秀家族的统治贴上衔接天命的标签,班固必须把王莽刻画成一个伪善、无能、巧滑且自命不凡的小人,“王莽篡汉”的说法就是《汉书》提出的。

桂陵完六月廿祖即位然後宗廟社稷
 復立天下艾安師古曰艾讀曰又
 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支業折節力行以
 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
 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
 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也
 取仁而行違者邪師古曰論語載孔子對子服之語而子服之言不仁之人服仁者之色而行則違之謂黨比周故勝在
 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文世業之權遭漢
 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

●《汉书·王莽传》

班固甚至不愿承认王莽当过皇帝，根据太史公司马迁定下的写史规则，记述皇帝生平的文字应该称为“纪”，班固却只在《汉书》第九十九卷中为王莽做“传”——《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刘邦的皇后吕雉一天皇帝都没有做过，班固却堂而皇之地在汉书中为其做“纪”——《汉书·卷三》（高后纪），承认吕后的皇帝地位，大概是因为吕后

并没有擅改国号，依然奉汉为正朔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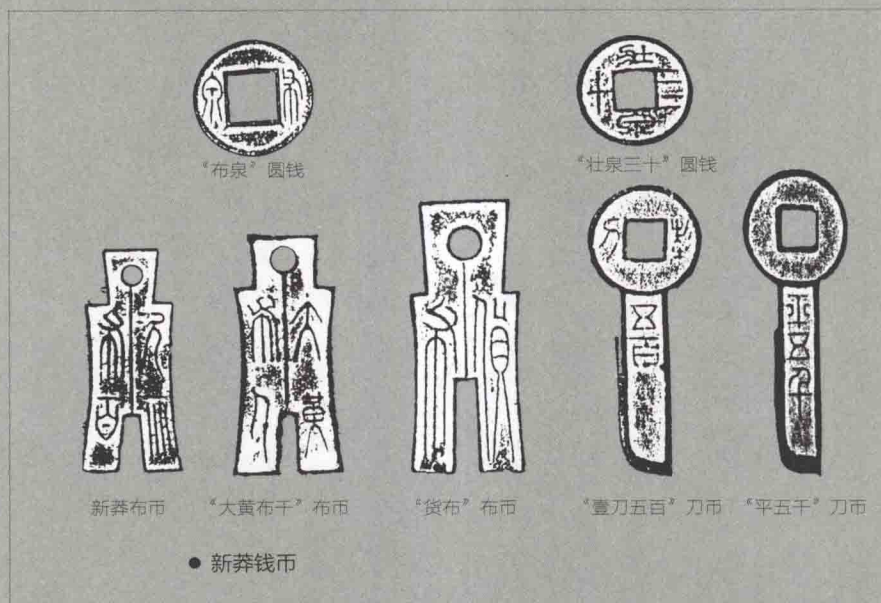
无论西汉帝国的最后几位统治者多么无能多么荒唐，东汉的史学家都坚持认为国不能改，祀不能断，以至于其后的两千多年，所有想搞“禅让”这一套的政治家都会小心谨慎，在正统与篡夺之间寻找平衡点。

王莽做了十五年的皇帝，如果从做大将军的时间算起（公元前7年），他参与统治中国的时间超过了三十年。由于缺乏研究材料，王莽之治的主要内容都集中在他颁布的一系列政策上。

公元第七、九、十、十四年，王莽下令发行新面值的货币，货币改革的核心目的是应对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多种面值的货币有利于物流交换，用今天的话来说也是拉动内需的重要举措。而且货币改革势在必行，因为通货膨胀已经到了让人民不能容忍的地步。

显然这种情况并不是王莽造成的，早在一百多年前汉武帝委派桑弘羊进行经济改革的时候，就已经为日后的社会动荡埋下了种子。

公元第九年的货币改革废除了五铢钱及刀币，另外发行宝货，包括五物（金、银、龟、贝、铜）、



六名(钱货、黄金、银货、龟、贝货、布货)，一共二十八种货币。多种货值的结果是矫枉过正，由于货币种类太多，换算起来又十分困难，因此流通更加不便。一年以后，王莽被迫废除刚刚施行的货币，只留小钱值一和五钱五十两种继续使用。

然而，新朝显然缺乏其他经济手段来抑制通胀，只好再次把目光放在币制改革上。公元十四年，王莽又废掉大、小钱，另作货布、货泉两种货币。货泉重五铢，货布重二十五铢，但政府规定一



● 国宝金匱直万

货布等于二十五货泉，货布的价值被人为地抬高了五倍，谁又会去使用货布呢？

这次改革，非但没有理清混乱的货币体制，反而加剧了混乱，所谓“每一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王莽并不需要为日益加深的财富两极分化承

担责任，但是王莽明显低估了人性的丑恶，前去推行货币改革的官员们开始借此机会上下其手，降低了货币的成色，货币贬值使参与改革的官员大获其利，进一步加深了人民对政府的仇恨。

值得一提的是，王莽发行的一系列钱币是中国古钱币史上的精品，他大概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美学大师。新朝时期的货币多采用悬针篆的字体，制作十分精美。国宝金匱直万上部为方孔圆钱形式，直径为3厘米，上书篆书“国宝金匱”四字，下部为短颈联方形泉身，边长为2.8厘米，身面纹内书悬针篆“直万”二字，标明这一货币值五铢钱一万，现今存世的仅有两枚，是价值最高的古钱币。

公元九年，政府的官僚机器被改组，新政府新气象本也无可非议。那些复古的官名非常精致典雅（又进入了美学的范畴），比如将大司农改名为羲和，太常改名为秩宗，大鸿胪改名为典乐，少府改名为共工。

公元十四年，又对地方组织的名称作了变动，郡县的名称也全部更改，如将淮阳改为新平，将梁郡改为陈定，但是新朝的地名改革显然过于烦烦，

有的郡名一年间更改了五次，以至于每次颁发诏书和公文，都要在新地名后注上旧地名（一郡至五易名，而还复其故。吏民不觝纪，每下诏书，辄系其故名）。这些政策被后人批评为表面文章，但是历朝历代，做这种表面文章的政府数不胜数，却很少有人像王莽这样背负着如此之深的骂名。

私人奴隶买卖也在公元九年被禁止。这一年，政府也试图进行土地改革，根据改革规定，所有壮丁将分配到标准面积的土地，拥有超出规定土地的人要把余地分给少地的亲戚和邻居，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不准出售。

实行“王田”的诏令刚一颁布，便遭到大小土地所有者的强烈反对。从阶级斗争的观点上看，地主阶级反对的农民阶级一定会拥护，说明王田令的初衷必然是好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照顾贫苦大众。但是中郎区博的上书似乎也有道理，区博说井田制跟不上时代，土地的私有已经深入人心，承认私有的产权是当前时代的主流，那些古代圣人之法恐怕不得施行了（井田虽圣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讫今海内未厌其敝。

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无百丰之渐，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施行）。在朝野一片反对声中，王莽在始建国四年（公元十一年），即诏令发布后的第三年，宣布取消王田。

公元十年，政府下令对酿酒、盐和铁器的交易以及对铸币和山泽地的收入实行国家垄断。政府在低价时购进，高价时售出，以稳定粮、布、丝等必需品的市场。为了应对统治地域的广大，政府在长安及全国五大城市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设立五均官，同时设立官仓。

也在这一年，政府对猎人、渔民、养蚕人、工匠、专业人员和商人的收入开征什一税，也就是逢十税一，这种税收的比例自古既有，也维持了一个相对较低的税收政策。其目的在于利用政府力量控制经济事业，平抑物价，限制商人囤积居奇，使贫民免受高利贷的盘剥。

这些政策和措施，实际上都是汉武帝时期桑弘羊所颁布的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延续。但是，推行这些政策的特权官僚阶级与地主互相勾结，原来为平抑物价防止商人渔利的五均，却变质成为官

吏贱买贵卖从中谋利的机构，他们“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结果给普通百姓带来更大的痛苦。

王莽是西汉末期的大儒，史书中说他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把一切政令、设施都弄得古色古香。他对典雅的文辞和美丽的形象有极高的创造力和鉴赏力，但是文人的气质也使他过于感性和随意，空有美好的理想却没有付诸实施的手段与能力，让这样的人来掌管一个国家不知是上天对他的眷顾还是神灵对他的惩罚。在以后的两千年里，这种悲剧反复上演，最有名的当然是宋徽宗和陈、李两位后主，他们一再证明了美不能填饱肚子这一事实。

新朝在十五年后土崩瓦解，悲歌却是在一开始就谱写好了的。但是，在公元九年的时候，拥戴王莽上台的人们是真心实意地相信他的，相信凭借着独特的人格魅力以及极具感染力的气质真的能拯救末世于危难，重新恢复周公时期的盛世。

即便在新朝大势已去，判军就要破城的时刻，朝中仍然有一千多位公卿大臣自愿陪着王莽受死。请注意，这一千多人都是朝廷中的重臣，并非是无

名无姓的市井鄙夫，说明即便在十五年的改革失败之后，王莽的感染力依然足以使人共同赴死。

所有政策，最后都走了样，但绝不能否认这些政策的初衷是美好的。在公元九年的时候，汉帝国最后几位统治者的无能与堕落表明“天命”已经开始转移。现在，五行中的“土”显然已经处于上升的位置，它将取代汉帝国“火”的统治，五行的命轮开始转入下一个时代。末世王朝的大救星适时出现，他是当代大儒，杰出的理论家，他的品格无可指摘，被万民奉为当世圣人。改朝换代的时机已到，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来临。

西汉末期的理论家们用“天命”与“五行”作为基础理论，解释王朝的更迭，似乎暗示了在“王权”之外还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感受到人心的向背，所谓施德政则天命仍在，不施德政则五行转移。如此说来，在帝国的时代，所有的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帝国兴与衰的基础在于施政者的方针是否恩惠了帝国的绝大多数民众。

看来，统治帝国就是这样的简单，施德政则帝国兴，反之则帝国亡。既然每个统治者都了解这个

简单的道理，帝国就应该永远兴盛而不会灭亡。新朝的每一项政策看起来都是德政，然而仅仅过了十五年，新朝就轰轰烈烈地倒塌了，一如它轰轰烈烈地建立。又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大家共创美好世界的理想如此之快地转变为一场灾难呢？

战国二百五十四年的历史，充满了统一中国形成帝制的各种契机。秦、西汉与新三朝是帝国为其命运作出各种尝试、不断探索的重要时期，这一社会实践的顶峰于王莽的新朝归于结束。其后的时光，只是对以上三朝制度的总结与不断完善。

